

# 从《丽人行》看杨氏兄妹

李 谊

《丽人行》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一首杰出的政治讽刺诗，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春。它通过对杨氏兄妹生活奢糜的描写，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罪恶。诗中并没有空发议论，而是尽情揭露事实，其讽意自见，艺术手法极高。正如浦起龙所说：此诗“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读杜心解》卷二之一）当时，唐玄宗在政治上日益昏庸腐朽，在生活上穷奢极侈，对杨贵妃及其家族的宠幸也愈来愈盛，还让杨国忠做右丞相，操纵朝政，独揽大权。杨氏姊妹的骄奢淫逸、奢侈豪华，已经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首诗正是诗人出于对这伙权贵的无比痛恨，为无情揭露和鞭笞他们的无耻丑行和反动本质而作的。

《丽人行》是一首新题乐府诗，具有浓厚的民歌色彩。诗的前十句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领起，先从体态（“态浓意远淑且真”）、肌肤（“肌理细腻骨肉匀”）、服饰（“繡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饰（“头上何所有？翠微匍叶垂鬟髻”）、裙腰（“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等各个方面描写了“丽人”之“丽”，揭露当时整个贵族妇女的骄奢，把后面对杨氏兄妹的揭露置于共同的典型环境中，使这种揭露具有普遍的意义。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诗的中间十句，以“就中”二字领起，从一般揭露贵族妇女的奢侈转入集中揭露杨氏姊妹仗恃其连皮贴肉的“椒房”之亲，飞黄腾达，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虢，指杨贵妃的三姊虢国夫人；秦，指杨贵妃的八姊秦国夫人。据《旧唐书》记载，杨贵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他们都获取了高位，享有极大的政治权势。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名贵的驼峰羹（当时贵族的名菜）刚从翠绿色的炊器中盛出，水晶盘子里装着鲜美的鱼。这是说她们吃的东西。但是，“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纭”。这些贵妇人拿着犀牛角做的筷子而不能下咽，她们实在吃得太腻（“厌饫”）了，使得刀环上装有鸾铃的刀为她们空忙了一阵（“纷纭”，忙乱的样子；“空纷纭”，枉自忙乱）。这两句诗深刻揭露了这伙腐朽反动政治势力的代表极端骄奢豪华的生活。据史料记载，他们的住宅富丽堂皇，有如宫殿：“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踰千万计，见制度宏伟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旧唐书·杨贵妃传》）他们利

用自己的权势，恣意搜刮财富：“每有所托，府县承迎，峻如诏敕，四方贻遗，其门如市”；甚至“十宅诸王及百孙院婚嫁，皆因韩、虢为介绍，均先纳贿千贯。”（同上）她们的生活竟然奢靡到这种程度：“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玳瑁芳馥于路”。（《旧唐书·杨贵妃传》）“箫鼓哀吟泣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她们在出游时为了摆排场，兴师动众，大动鼓乐，闹得鬼神都不得安宁；宾客和随从之多，以至把交通要道都堵塞了。这群噬人肉肉的害人虫，简直象瘟疫一样，所到之处无不深受其害。就是她们的家奴，也仗恃其主子的权势，为非作歹。“杨氏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陈昌裔扶公主，因及数挝。”（《旧唐书·杨贵妃传》）说明公主、驸马也要受其家奴的凌辱，一般的人民群众就更不必说了。

她们为什么如此奢侈豪华和飞扬跋扈呢？杜甫在诗中透露了此中的消息：“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她们所享受的种种美味食品（“八珍”），不仅都是来自唐玄宗的“御厨”，而且还是皇帝派太监老爷（“黄门”），骑上飞跑的马（“飞鞚”），接连不断地送来供她们享用的。这说明杨氏姊妹所以如此任意挥霍，肆无忌惮，乃是由于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杨氏姊妹凭借此“椒房”之亲，进而受到皇帝直接庇护的结果。杨贵妃本来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妃的妃子。据史书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宠幸的“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僭内太真官中。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资治通鉴·唐纪三一》）并在天宝四年（745）正式册为贵妃。这时，唐玄宗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头子了。他这个人也真有点荒淫得可以，自己本来已经有宫妃数千，却一个也看不上，非要霸占自己的儿媳妇不可。而杨贵妃也是一个卑鄙无耻、善于奉迎的坏女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不仅她本人受到特殊宠幸，而且其兄、姊以至整个家族都仗恃其裙带关系飞黄腾达起来，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应当承认，唐玄宗在其早年尚能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在其后期的生活与行为，却并不亚于历史上的隋炀帝。他终日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每日“诸公主互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郑处海《明皇杂录补遗》）特别是宠幸杨贵妃以后，不理朝政，做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的“太平天子”，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唐玄宗为了取得杨贵妃的欢心，对其有求必应：杨贵妃要穿好的，用好的，“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旧唐书·杨贵妃传》）；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就下令用快马从岭南（今广西、广东一带）传送，“比至长安，色味不变。”（《资治通鉴·唐纪三一》）与此同时，唐玄宗还把那些迎合杨贵妃，满足其享乐需要的坏蛋，都加以重用提拔，给予高官厚禄，如“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同上）对于唐玄

宗这些倒行逆施，杜甫在他的其它诗篇中不止一次地给以谴责。如“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白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桔》）；“寒壑布衣蛤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释闷十二首》），对为了能让杨贵妃吃上新鲜荔枝而使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在《自京赴奉先县詠怀五百字》这首有名的宏伟诗史中，杜甫更把唐玄宗和杨氏兄妹一伙的穷奢极欲与劳动人民的饥寒交迫作了对比：一方面是“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另一方面却是“路有冻死骨”。并且强烈地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就是说，他们的这种豪华生活，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白骨之上的。不仅如此，“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杜甫在这里还把杨氏兄妹比作汉武帝时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指出皇宫（大内）中的金银财宝，已经全都被他们弄走了！

《丽人行》的最后六句，集中地揭露了杨国忠不可一世的丑态。“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看啊！窃居丞相高位的杨国忠出场了，他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下飞马而至，当轩下马，旁若无人。“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在他这种炙手可热的权势面前，大家还是走远一点好！杜甫在他的笔下，对这位当朝丞相给予极大的鄙夷，不愧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硬骨头。这里需要提出研究的是中间二句“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的所指。有人认为这是描述杨国忠到来的声势：惊动得杨花飘落，群鸟狂飞。这种理解，从上下文来看，还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我们认为从此诗讽刺的深度来看，似指杨氏兄妹之间的淫乱关系。据记载，“虢国（夫人）又与国忠乱焉，略无仪检。每入朝谒，国忠与韩、虢连辔，挥鞭骤马，以为谐谑。从官媼奴百余骑，秉烛如昼，鲜装炫服而行，亦无蒙蔽。衢路观者如堵，无不骇叹！”（《乐史·杨太真外传》）请看，他们在举行朝拜大礼的路上，在大庭广众万目睽睽之下竟敢如此，在背地里搞些什么鬼名堂就可以想见了。“杨花”似指北魏胡太后与杨白花私通，杨畏罪潜逃，胡太后想念他，作《杨白花歌》，中有“杨花飘荡落南家”句（见《魏书·胡太后传》）。“青鸟”，神话中的仙鸟，西王母的使者（见《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后用以泛指传递消息的人。杜甫通过这两个典故暗示他们兄妹之间暗传消息，乌七八糟，进一步揭露了这伙衣冠禽兽的卑鄙无耻。

杨国忠何许人也？他本名杨钊，是杨贵妃的从祖兄。他年青时，就“不学无行，为宗党所鄙。从军于蜀，得新都尉；考满，家贫不能自归，新政富民鲜于仲通常资给之。”（《资治通鉴·唐纪三二》）天宝四年（745），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曾千方百计地打算走杨贵妃这个后门。他要求鲜于仲通为自己拉关系，但因“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无法与杨贵妃搭线，只好把杨国忠推荐给他。章仇即把杨“辟为推官”，并“使之献春缣于京师”，皆为“蜀货之精美者”，“可直万缗”。杨国忠“至长安历抵诸妹，以蜀货遗之，曰：‘此章仇公所赠也’”。于是“诸杨誉兼琼”，并把国忠引见给唐玄宗，“得随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参军”（《资治通鉴·唐纪三二》）。这件事充分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权贵之间相互利用的情况。他们各自怀着卑劣的目的，想方设法，力图取得封建最高统治者对自己的信任；章仇兼琼是想通过杨国忠同杨贵妃拉上关系，从而获得唐玄宗的宠幸；而杨国忠则利用章仇兼琼“可直万

缙”的“精美”“蜀货”，向几个妹妹进行贿赂，使之在唐玄宗面前为自己吹嘘。结果确实捞到一个虽然不高的官职，但却是他作为接近杨贵妃、唐玄宗以及不断往上爬的重要阶梯。天宝七年(748)，杨国忠由于裙带关系和“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岁中领十五余使。甲辰，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资治通鉴·唐纪三二》），并“权京兆，赐名国忠”（《旧唐书·杨国忠传》）。从此以后，他更是扶摇直上，飞黄腾达。天宝十一年(752)，唐玄宗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凡领四十余使”（《资治通鉴·唐纪三二》）。从此独揽大权，为所欲为，误国害民，干了大量坏事。杜甫对其深恶痛绝，大骂“乡里小儿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投简咸两县诸子》）

唐玄宗后期的政治腐败招致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杨氏兄妹的痛恨。不应忘记，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爆发的企图夺取唐政权的“安史之乱”，也是打着“以诛杨国忠为名”（《旧唐书·杨国忠传》）的旗号干的。“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打算让太子(李亨)监国，自己亲征，但却遭到杨氏姊妹的极力阻挠。杨国忠对韩、虢、秦三夫人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妹妹并命在旦暮矣。’杨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资治通鉴·唐纪三二》）唐玄宗果然屈从了杨氏姊妹，放弃了亲征。在叛军长驱直入，潼关失守，长安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杨国忠又首先倡议向四川逃跑。唐玄宗对其言听计从，于天宝十五年(756)六月以“亲征”为名，带着杨氏兄妹仓皇逃命。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将士饥疲，皆愤怒”（《资治通鉴·唐纪三四》），兵士们对杨氏兄妹篡权误国的愤恨象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了。护送唐玄宗的禁军首领陈玄礼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及韩、秦国夫人，并逼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陈仓县令得知消息，也把虢国夫人和杨国忠的老婆干掉了。祸国殃民的杨氏兄妹，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杜甫得知了这一消息，简直高兴得拍手称快。在他的另一首宏伟诗史《北征》中，他欢呼：“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把杨贵妃斥之为历史上乱君祸国的褒姒和妲己：“不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并且尽情歌颂和高度评价了陈玄礼为国除害的正义行动：“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但是，必须指出，杜甫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诗人，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即使他的杰出政治讽刺诗也不例外。他在诗中虽然揭露和谴责了以杨氏兄妹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罪恶，但却根本无法认识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乃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本身，因而诗中不可能抨击和反对这个制度。这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的。